

王涛 著

人、城邦与善

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涛著

人、城邦与善

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城邦与善: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研究/王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419-7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B502.233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0490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金 婕

封面设计 夏一琴



人、城邦与善

——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研究

王涛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01,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419-7/D·2273

定价 32.00元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目的论与人性

第一章 自然目的论	33
第二章 人性及其目的	49
第三章 政治学与人类善	64

第二部分 城邦的权威和目的

第四章 城邦的自然性	81
第五章 城邦的目的	92
第六章 城邦生活的政治要素	104

第三部分 政体问题

第七章 最佳政体	119
第八章 次佳政体	130

第九章 变态政体	141
----------------	-----

第四部分 城邦的公共教育

第十章 公共教育	159
第十一章 教育规划	173
第十二章 音乐教育	184
附录:简评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评注》英译本	197
参考文献	202
后记	208

导 言

作为西方学术传统乃至文明奠基者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其著作在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不断地被编辑、注疏、研究和应用。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面对政治学过度自然科学化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内在危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再次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影响至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现象。与此之前的十九乃至十八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不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并非是单纯出于历史兴趣^①，仅只把亚里士多德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正如学者所言，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不是学习同亚里士多德有关的事情(learn about Aristotle)，而是要从亚里士多德之处学习(learn from Aristotle)，汲取思考乃至化解当下理论问题的资源。^②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主要发生于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三个领域，涉及实践理性、社群主义、古典自然正当、德性伦理、公民身份等诸多主题，对相关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学者弗朗哥·沃尔比(Franco Volpi)的总结，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及其相关讨论的扩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关节点：(1) 出生于德国但在二战前后流亡到美国的一些德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的思想走向成熟时，为应

① 如老一辈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 Bekker)、英格拉姆·拜沃特(Ingram Bywater)、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沃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等。

② Robert C. Bartlett and Susan D. Collins, Introduction, in *Action and Contempl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对现代性危机而着力阐述与复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2)在当代德国哲学界，围绕着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实践理性(*phronesis*)以及其他伦理概念，展开了较为持久的讨论，而且在这场讨论之中，有众多学派参与，比较知名的有：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特奥多尔·维森格伦德·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理性主义学派的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和汉斯·兰克(Hans Lenke)，释义学代表人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及其弟子吕迪格·布勃纳(Rüdiger Bubner)。沃尔比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的概括，主要局限于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集中于德国哲学传统中。作为此种“德国现象”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主要关切的是恢复亚里士多德对实践(*praxis*)概念和实践科学的理解，以遏制社会科学在对科学方法的过度追求中丧失把握现象能力和道德认知能力的趋势，以此为现代性及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提供替代选择。^①

实际上，除了欧洲大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现象之外，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中最为强劲，而且也是对中国大陆影响最深的是英美学界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学者约翰·华莱士(John Wallach)将英美学界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概括为分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analytical Aristotelianism)、基础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fundamentalist Aristotelianism)和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traditional Aristotelianism)，其代表人物分别是特伦斯·欧文(Terence Irwin)、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斯蒂芬·萨克艾瓦(Stephen Salkever)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②此外，经由阿伦特等人对亚里士多德政治阐释影响，在英国的剑桥思想史学派中，亚里士多德以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的形象出场。而且，在社群主义中，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主义及其对友爱的解释成为重要

① Franco Volpi, *The Rehabilita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Neo-Aristotelianism*, in Robert C. Bartlett and Susan D. Collins(eds.), *Action and Contempl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② John Wallach, *Contemporary Aristotelian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4, Nov. 1992, pp. 613-641. 文中提及学者的相关著作，因篇幅所限，恕本书不一一列举，其中有不少著作已有中译本，读者很容易就能检索到。

思想资源。^①在华莱士看来,与欧洲大陆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中的关切相似,英美学界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样也是立足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各种道德和政治危机,在对自由主义和启蒙理想内在病症之警醒意识的引导下,力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以寻找用以诊疗与节制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以上各种路向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应对当下问题作出富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之时,也存在其各自的不足:

第一路向的欧洲大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虽然唤醒了人们对割裂了知识和行动的现代政治学的批判意识,但在理解和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时,却将此概念背后的一整套形而上学、人类学和宇宙论预设弃之不顾,使其对实践理性的理解脱离亚里士多德的整体思想框架,未能为现代政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困境提供有力的替代方案。

第二路向的英美亚里士多德主义力图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的德性伦理来改变西方社会自由个人主义道德秩序的混乱状态,确立社群和公共领域对公民生活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将亚里士多德引入对当下西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之中,但其仅只发挥亚里士多德著作中对其论述有利的方面,而没有全面地衡量和把握其著作的背景,时常错置了他的理论观点的具体情景。

第三路向的思想史研究以及社群主义尝试以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有关古典时代的城邦价值、公民德性和公民教育的观点来补救现代自由民主

① 关于英国剑桥思想史学派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参见 Quentin Skinner, *The Rediscovery of Republican Value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关于社群主义所引起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参见 Bernard Yack, *The Problems of a Political Animal: Community, Conflict, and Justice in Aristotelian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Lorraine Smith Pangle, *Aristotle and the Philosophy of Friend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阐释并不准确,得到诸多学者的批评。参见 Hauke Brunkhorst, *The Modern Form of The Classical Republic*, in *Action and Contemplation: Studies in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ristotl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Eric S. Petrie, *Aristotle and Liberalism*, in Sharon R. Krause and Mary Ann McGrail(eds.), *The Arts of Rule: Essays in Honor of Harvey C. Mansfield*,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9.

社会中公共精神衰微、政治冷漠等政治病症。尽管其重视亚里士多德关于共和主义的思想,但却缺少对之系统的专门研究,对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只是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另一方面,其自由主义立场也往往割裂了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的整体背景,从而曲解了他关于公民德性和公民行动的观点。

然而,对于这场亚里士多德主义复兴,本书只需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背景即可,无意对之进行深入地梳理和介绍。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以与本书更有直接关系的是清理有关《政治学》文本的已有研究。由于《政治学》在文本结构与实质内容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与冲突,在《政治学》的编辑、注疏和研究中,文本结构成为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的关键问题。《政治学》的文本结构问题不仅是古典语文学家的棘手疑难,而且因为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文本疑难,直接关系到如何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所以文本结构问题更成为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者需要予以处理的首要任务。于此,无论在古典语文学领域,还是在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理解《政治学》的文本结构同诠释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成为紧密相关的课题。

在 20 世纪初期至今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中,在《政治学》文本结构问题上,先后有过三种比较重要的研究视角,依次为以耶格尔、乔治·霍兰·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为代表的发展论,以戴维·凯特(David Keyt)、弗雷德·D. 米勒(Fred D. Miller)等为代表的分析论,以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为代表的隐微论。针对《政治学》文本结构及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这三种视角各自都提出富有意义的解读,但也都有其无法摆脱的不足。深入分析与梳理这三种视角在处理《政治学》文本结构疑难和阐释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上的得与失,是进行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背景与问题

对《政治学》文本结构的分析,离不开对现有的《政治学》文本乃至《亚里士多德全集》来源的考察。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间隔两千多年之久,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的流传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其文本在流传、辗转之中经历后人的多次编辑,进而给《政治学》文本

结构带来不少问题。由此,简单回顾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的流传和编辑历程,有助于展开对《政治学》文本结构问题的考察。

古典学家们一般认为^①,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 322 年去世后,他的所有手稿作为吕克昂学院(Lyceum)的公共财产,交由弟子泰沃弗拉斯特斯(Theophrastus)管理。在泰沃弗拉斯特斯死后,奈勒斯(Neleus)继承吕克昂学院图书馆后,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手稿从雅典带到了小亚细亚地区的斯基比斯城(Scepsis)。为了防止被波加穆(Pergamum)的国王抢走,奈勒斯的后人把亚里士多德手稿埋在地窖,但手稿后来被遗忘。直到公元前 1 世纪初,一位名叫阿佩利孔(Apellicon)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爱好者和藏书家,发现了这批手稿,将之买走带回雅典。在斯基比斯城逗留期间,阿佩利孔企图修复那些手稿损坏的部分,填补其中的空缺之处,结果却把这些手稿编成一套充满错误的集子。公元前 86 年,苏拉(Sula)征服雅典,得到了这批手稿,又将之带回罗马。罗马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得到这些手稿,对之重新排序、编辑,并勘定了最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以及泰沃弗拉斯特斯全集,而我们现有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就出自安德罗尼柯的编辑。^②

公元前 3 世纪中期以后,漫步学派急剧衰落,使整个希腊化时期的人们普遍不熟悉亚里士多德著作,但在公元前 1 世纪左右,漫步学派及亚里士多德主义又重现、复兴。有研究者认为,漫步学派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是亚里士多德手稿被再度发现和流传的结果,可见漫步学派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起落与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所经历的波折密不可分。后来的一些史料间接证明,确实是安德罗尼柯把那些散乱无序、纸张受损的手稿

① 汪子嵩:《古希腊哲学史》第 3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 页;[德]E. 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5 页;Carnes Lord(trans.), *Aristotle: The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Introduction";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V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59-65; Jonathan Barnes(ed.), *A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0; Georgios Anagnostopoulos(ed.), *A Companion to Aristotle*, Wiley-Blackwell, 2009, p. 15; 亚里士多德著作流传的说法主要来自于两位古代作家的记录: [古希腊]斯特拉博(Strabo),《历史纲要》,13. 1. 54, [古希腊]普卢塔克(Plutarch),《苏拉传》,26; 格思里(Guthrie)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第 62 页。本书此处叙述参考了所引著作的相关内容。

②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VI, p. 64.

经大幅度地重组和编辑,将具有相似主题、却又各自独立的篇章汇集起来,整合成一部相互关联、体系完整的著作。如果说我们现有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确实是经过了安德罗尼柯的编辑,那么就带来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现有的《政治学》的篇章结构与亚里士多德去世时的手稿状态是否相同?被安德罗尼柯编辑在一起的手稿是否都是出自亚里士多德本人之手?抑或夹杂了其弟子及后继者撰写的相似主题的作品?按照古代的书目,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和泰沃弗拉斯特斯都写过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安德罗尼柯是否把他们两人的著作都编在一起,甚至还加入其他漫步学派人士的相似著作?安德罗尼柯编辑的版本,是否可能仅仅是对早期漫步学派相应著述的一部汇编?

虽然这些问题似乎让我们感到不安,但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充分、确凿的材料与证据来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解答,本书也不准备探讨这些问题。总体上,现代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现有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就是经过安德罗尼柯编辑并流传下来的版本,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著作。但以课程讲义形式呈现的《政治学》,在文本形式与实质内容上,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第1卷论述城邦起源、奴隶制、获取方式以及家庭;第2卷论述前人的最佳政体学说与现实城邦政体,尤其花较大篇幅批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的政体设想;第3卷论述公民、政体、民众德性与王制;第4、5、6卷论述变态政体类型、城邦党争、革命及保存策略;第7、8卷是整部《政治学》的高潮,论述最佳政体及其教育。一般来说,学者根据主题的相似性将这八卷内容分成3组,第1组为1、2、3卷;第2组为4、5、6卷;第3组为7、8卷。但这三组的主题似乎比较难以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而更进一步确定三组间的逻辑顺序的努力又遇到这样几类障碍:(1)各卷之间的交叉参照(cross-references)并不准确,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第1卷中对某个问题的分析会戛然而止,说将会在第3卷某个地方继续分析这个问题,但在第3卷他所提示的位置,我们却没有发现对该问题的讨论,甚至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现;(2)一些篇章的内容并不完整,最为明显的是第6卷、第8卷,第6卷最后一个句子残缺不全,第8卷对教育的论述没有按照首章规划说完;(3)问题最明显、也最重要的是,根据文本表面叙述,现有八卷的排序似乎不尽合理,尤其是第3卷末尾章节暗示接下来要讨论最佳政体,但随后的第4、5、6卷

讨论的却是政体分类、混合政体、政体变革与保存、政体构成等更具现实色彩的问题,直到第7、8卷才又开始讨论最佳政体,在很多学者看来,第4、5、6卷像是被突兀地插入第3卷与第7、8卷之间。然而,在现有的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中,不仅《政治学》,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也大都存在类似的文本结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亚里士多德注疏家来说,这似乎并不是障碍。在他们的注疏中,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对文本结构问题进行过讨论。例如,古罗马的阿斯帕修斯(Aspasius)对《尼各马科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的注疏^①,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endra of Aphrodisias)对《形而上学》的注疏^②,公元10世纪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Alfarabi)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③。而且,在中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著作从阿拉伯地区重新传入欧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逐渐地被译为拉丁语,亚里士多德主义也因此在欧洲复兴。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注疏了亚里士多德大多数著作,其中包括《政治学》,但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况,他从未花笔墨去讨论文本结构问题,尽管他对《政治学》的注疏只到第3卷第8章。^④对《政治学》文本结构的质疑与讨论则是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中世纪晚期《政治学》拉丁译本的增多,以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疏《政治学》,现有文本结构的合理性才逐渐引起学者的怀疑,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篇章顺序问题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一致性的关系。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政治学》现有篇章顺序合理性的怀疑达到顶点^⑤,大多数

①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Arthur Madigan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Alfarabi, *Philosophy of Plato and Aristotle*, Muhsin Mahdi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Aspasius, *O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1-4, 7-8"*, David Konstan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王涛:《简评阿奎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评注〉英译本》,《古典研究》2010年秋季第3期,香港,第119页。

⑤ 1577年,意大利学者斯卡伊诺(Scaino)开始重新编排《政治学》的各卷顺序,参见 Peter L. Phillips Simpson,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o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UNC Press Books, 2002, p. xvii, 以及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books I - V: 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by Franz Susemihl and Robert Drew Hicks,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p. 16.

学者认为现有篇章顺序的前后颠倒或许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编辑所致,或许由漫步学派后人的编辑所致,进而使人们产生这样的认识:在《政治学》中,并不存在一个前后一致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各篇章并不是被计划为一个整体而写作,甚至有可能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由此,很多《政治学》的译者和注疏家,选择从文本的内在逻辑思路、交叉参照的对应关系入手,试图重新建构起真正的、原初的篇章顺序,虽然在这些尝试中,有不少学者提出很多似有说服力的根据,涌现出很多富有睿智与创造性的方案,但由于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始终都未能彻底解决文本结构问题。

尽管文本结构问题似乎直接关乎文本形式,涉及文献考据,但对《政治学》现有文本形式的怀疑直接接触及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理解,甚至人们怀疑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一致性和权威性。可以看到,这种疑古之风与古代学者的信古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差别。自此,在疑古风中兴起的欧洲古典学,开始有学者逐渐把考证《政治学》篇章结构形式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们往往根据文中各种线索(例如交叉参照),来重新安排《政治学》各卷顺序,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化解文本形式的疑难,证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前后一致。但此时研究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分析都是逻辑分析,他们对著作之前的观点冲突或某一部著作之中的前后冲突的处理往往是这样:把在理论观点上与已被接受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基本思想有差异的著作视为伪作。例如,《欧德谟伦理学》(*Ethica Eudemia*)在观点上与《尼各马科伦理学》有较大差异,有不少学者就把前者视作欧德谟(Eudemus)的作品,而非亚里士多德本人所作;《解释篇》中关于判断的理论观点与《分析篇》有较大差别,因而也被视为伪作。^①在处理不同著作之间的冲突时,采用这种做法还是可以接受的,但面对同一部著作中观点的前后变化与差异,就显得理屈词穷。逻辑分析方法停留在文本形式,比较少深入到文本实质内容来解决这些问题。单纯地根据交叉参照以及其他文本线索,似乎难以对《政治学》文本结构问题有更为合理的解释,而且对《政治学》实质内容本身的理解反而变成次要工作。德国古典语文学家耶格尔的发展论即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出现。

^① 参见 I. During and G. E. L. Owen(eds.), *Aristotle and Plato in the Mid-Fourth Century*, Goteborg, 1960.

二、耶格尔与发展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历史主义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德国古典语文学^①，而耶格尔的编年学发展论(chronically development theory, 以下简称发展论)可被认为是历史主义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的具体体现^②。在 1912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发展历史之研究》中^③，耶格尔用发展论的方法，将《形而上学》中前后观点的差异乃至对立解释成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发展变化的结果，由此解决了一些学者们争论多年的问题。随后，他尝试运用发展论的方法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其全部努力之体现就是 1923 年出版《亚里士多德：其发展历史之原则》(*Aristoteles: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seiner Entwicklung*)一书^④。耶格尔的发展论克服了以往逻辑分析的不足，为当时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现代亚里士多德学术始于耶格尔”^⑤，“他的成就给亚里士多德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为之开辟了一条新路”^⑥，以至于“想要发现没有提到这部著作的一项亚里士多德研究，都很不寻常”^⑦。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耶格尔力图“历史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将“有机发展”的原则应用于亚里士多

① 美籍德裔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认为，在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历史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渗透到德国的所有人文与文化科学之中，结果语言学、语文学、经济学、艺术、法学、哲学和神学都成为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参见[美]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 页。

② 关于耶格尔的发展论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参见 Franz Dirlmeier, “Aristotelesin,” *Aristoteles in der neueren Forschung* (q. v.), hrsg. Von Paul Moraux, Darmstadt 1968, pp. 144-157.

③ Jaeger, *Studie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Metaphysik des Aristoteles*, 1912.

④ 该书英译本为 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Richard Robinson(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34.

⑤ Anton-Hermann Chroust, *Aristotle: New Lights on His Life and on Some of His Lost Works*, Vol. I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p. 231.

⑥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Aristotle An Encounter,” Vol. V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

⑦ Harold Cherni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56, No. 3, Baltimor: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261-271.

德研究,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看作是在其对“现实的直觉性洞见”的引导下^①,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不断扬弃的线性历史发展,并力图从亚里士多德的个性及生存经历中,寻找思想演变的根源,以展示其思想鲜活、富有创造性的“发展过程”^②。

与近代早期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不同,耶格尔并不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看作是一个一致、融贯的静态思想体系,而是将之理解成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核心线索就是他与柏拉图思想关系。耶格尔认为,通过考察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思想关系,就能确定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思想发展阶段,进而通过将著作文本中前后不一致乃至对立的观点,追溯至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该著作文本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写作时期,以此解决文本结构中的矛盾。在耶格尔看来,用以判断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思想关系的标准是他对待柏拉图学说的基本态度,如理念论、灵魂论、理想城邦学说等。耶格尔的基本假设:当亚里士多德赞同柏拉图学说时,表明他是处在深受柏拉图影响的青年时期;当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学说时,表明他已经在力图摆脱柏拉图学说,开始发展自己的方法和思想,或者说在走向成熟的阶段。据此,耶格尔将亚里士多德一生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17岁进入学园,跟从柏拉图学习,受柏拉图影响很深,尚未形成自己的见解,主要著作是公开出版的对话录,此为柏拉图主义阶段;(2)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于40岁左右离开学园,访问小亚细亚的僭主赫尔米亚(Hermias),在阿索斯(As-sos)、米提林那进行动物学、植物学方面的调查,后到马其顿做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回到雅典,这段时间有四年左右,开始批判柏拉图学说,采用调查方法,进行经验研究,并因宫廷政治经历的影响,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现实政治,此为转折阶段;(3)从马其顿回到雅典,创建吕克昂学园,放弃柏拉图理念论等学说,创建运用调查方法的经验科学。耶格尔运用编年学的方法,确定了亚里士多德从遗失的早期对话录[如《欧德谟篇》(*Eudemus*)、《劝勉篇》(*Protrepticus*)],一直到晚期的论文与讲义

① 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Richard Robinson(trans.), Oxford University, 1934, p. 4.

② *Ibid.*, p. 7.

的写作时期,通过这些著作与亚里士多德的人生经历与生活环境之间建立起的对应关系,梳理出其思想从早期柏拉图主义的不成熟阶段,走向确立经验主义实证科学的成熟阶段的过程。在耶格尔看来,《政治学》的八卷内容本身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体现。

在亚里士多德众多的政治类作品中,耶格尔认为《政治家》、《论正义》是其早年对柏拉图同名对话录的模仿,而关于 158 个城邦政体状况的经验调查则是他晚期成熟阶段的作品(例如《雅典政制》)。于此,在确定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本发展阶段之后,耶格尔以其早期作品作为标准来衡量《政治学》八卷内容与其早期思想之间的距离。^①耶格尔将被学者公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早期著作并于 20 世纪初复原的《劝勉篇》残篇,作为其早期思想的代表。耶格尔认为,根据《劝勉篇》的内容,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早期的政治学与柏拉图以善的理念为基础的政治学是一致的,都是关注政治学的精确性和规范的理论科学,用理念论意义上的“自然(phusis)”作为理想标准考察、衡量政治生活,因而与从经验中获取标准,以指导政治家的实践性政治学截然不同。^②“由此,亚里士多德最初认可的政治思想的唯一形式就是从柏拉图传下来的那种形式,即乌托邦。他寻求绝对标准,而这个标准并不来自于经验。”^③在耶格尔看来,这些文本形式上的矛盾,与其说可以单纯地用篇章之间的顺序调整得到完全解决,毋宁说文本形式的矛盾带来的语文学疑难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结构方面的困难”^④。在这个思路引导下,耶格尔用这些早期著作中的学说来衡量《政治学》八卷内容的学说特征,认为其中一部分内容折射出一位关注柏拉图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另一部分内容又折射出一位提出清醒的经验科学的现实主义者形象。在这八卷之中,既有沿袭柏拉图的思想路线,建构理想城邦的内容,又有不谈理想城邦,立足于调研方法的经验研究,为现实政治出谋划策的内容。

耶格尔认为,第 2、3 卷对城邦政治进行的规范分析与第 7、8 卷采取的分析方法是一致的,可以把第 7、8 卷看作是亚里士多德有关理想城邦

① 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Richard Robinson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1934, p. 260.

② Ibid., p. 261.

③ Ibid., p. 263.

④ Ibid., p. 264.

的学说,第2、3卷则是这一理想城邦学说的导论,而且可以认定《政治学》的第2、3、7、8卷是亚里士多德的早期作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学》第4、5、6卷没有丝毫建构理想城邦的柏拉图主义特点,亚里士多德也在其中回避了对最佳政体的讨论,同样也没有把最佳政体作为讨论现实政体的规范标准,反而用对政体分类的生物学划分取代了绝对的逻辑划分,展现出丰富多样的现实政体种类,而他对生物学标准的应用体现出他在晚年时期把自然研究的经验方法应用到政治分析。耶格尔认为,在第4、5、6卷中,“亚里士多德不偏不倚地观察经验现实,从特殊的现象出发,寻求发现现象的内在规律,如同科学家观察有生命事物的典型运动和情绪一样,甚至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城邦疾病与疗救的理论都是以医生的病理学和医学为模范的。”^①至于第1卷,耶格尔认为它是在把第4、5、6卷插入第3卷与第7卷之间后增补的内容,其作用在于将原有内容扩充为更一般性的政治理论。第1卷对政治生活更为一般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如城邦起源、奴隶制、家庭经济等,尽管还要许诺探讨婚姻与孩童问题,但由于第2卷在批驳苏格拉底理想城邦时已经谈及了这两个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遂放弃了在第1卷中继续讨论婚姻和孩童问题。由此,从写作时间上来看,《政治学》各卷的准确排序应该是2、3、7、8、4、5、6、1。耶格尔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结尾处的“政体研究纲领”印证了这一排序的合理性:

我们将根据所搜集的政体汇编,考察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使有些城邦治理良好,使有些城邦治理糟糕。因为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何种整体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②

在耶格尔看来,这段话表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写作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意味着他放弃了曾经追随过的柏拉图“纯粹的建构性方法”,开始

^① 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Richard Robinson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1943, p. 271.

^② 1181b12—2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